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上海高校智库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财政政治学译丛

刘守刚 魏 陆 主编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国家的财政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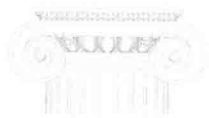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上海高校智库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财政政治学译丛

刘守刚 魏 陆 主编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国家的财政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著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财政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著;沈国华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8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财政政治学译丛

书名原文: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ISBN 978-7-5642-2752-4/F·2752

I.①国… II.①詹… ②沈… III.①财政危机-研究-美国
IV.①F81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5698 号

□ 责任编辑 袁春玉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GUOJIA DE CAIZHENG WEIJI

国家的财政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 著
(James O'Connor)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同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 000mm 1/16 17.75 印张 271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49.00 元

图字:09—2015—766 号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James O'Connor

Copyright © 2002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3 by St. Martin's Press.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0 Corporate Place South, Suite 102, Piscataway, New Jersey 08854.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copyright © 2017.

2017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致 谢

本书源自于两篇发表在《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杂志上的文章——“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和“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与劳动阶级”(Inflation, Fiscal Crisis, and the Working Class)。笔者要在这里感谢《社会主义革命》杂志的编辑让我占用他们的杂志为本书所阐述的思想进行“试验”，还要感谢他们对文章提出的宝贵的批评意见，并且鼓励笔者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写书出版。我也要感谢给“国家的财政危机”一文原稿提出宝贵批评意见的 Doug Dowd、Joan Robinson 和 Lynn Turgeon。我要特别感谢 Stephen Liebfried、David Gold 以及德国斯塔恩贝格(Starnberg)马克斯—布朗克(Max-Planck)学会会员——尤其是 Claus Offe 和 Ulrich Rodel——在笔者 1972 年秋天访问期间对手稿全文进行了审阅。我还要感谢提醒我注意近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府发展重要意义的 Dan Feshbach。此外，我还想感谢 Ellen Estrin，他的批判性研究对于本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我想强调像本书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性经济研究的普遍兴盛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而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性研究的普遍兴盛则反过来可归因于目前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新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我要特别感谢很多在财政危机论不同发展阶段听笔者介绍这种理论的听众，他们的提问和评论对于帮助我厘清本书阐述的很多具体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事务版序

《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初版)完稿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是作者个人切身经历、知识体验和政治体验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1)我的公共财政学背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我曾做过当时美国公共财政研究泰斗卡尔·舒普(Carl Shoup)的助理。这项工作使我朦胧地感觉到后来被我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东西中并没有任何清晰阐述预算规模、预算主要支出项目、税种和税收金额以及预算的总体分配影响等问题的国家预算理论。那时候,作为一名持左派政治观点的在培经济学者,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理论必然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是政治社会学理论。当时,关于政治经济学,我知之甚少;而对政治社会学,则更是一窍不通。

(2)我对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1966)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¹的研究。我特别关注这两位作者对国家支出——全被定义为“经济剩余”(甚至不会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不成问题的论述。我的研究表明,某些种类的国家支出具有(直接或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剩余价值。但是,其他种类的国家财政支出,如福利支出,并不能被如此看待,这一点令人困惑。那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国家预算理论。我终于相信,以相同的方式从理论上阐述军费开支与(譬如说)教育支出肯定存在某种严重的错误。

此外,美国的军事部门培育了大量的劳动者,而美国的教育体系是按照一种准军国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美国政府的预算项目并不总是以一种

令理论工作者愉悦的方式进行简单划一的分类。更成问题的是,任何给定类别的预算支出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在特定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形态的历史背景下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税收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都暴露出一些不必要的弱点。例如,在构建减税理论方面,这两种经济学理论都没有区分穷人需要更多的钱养家糊口而对他们实施的减税以及由于“经济系统需要消费者多花钱”而对中产阶级实施的减税。前一种减税遵循的是一种社会福利减税观,第二种减税奉行的则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观。这两种减税观还要与另外一种减税观(即由于“经济系统需要更多的储蓄和投资”而给富人减轻税负)展开角逐。阶级斗争似乎包含在其他方面的税收政策话语中。有人认为,富人只有靠国家减税省下钱来才能把他们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而穷人只有因国家削减福利支出而领到较少的补助才可能增加对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阶级分析视角[我没能从《国家的财政危机》(*Fiscal Crisis*)中充分运用阶级分析法]的研究得出了更多从所征不同税种的社会学意义看值得关注的结论。增值税在阶级斗争相对比较激烈的欧洲是一个重要税种,因为这个税种有助于隐瞒税负主要由劳动人民承担这个事实。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源自于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曾经(并且现在还是)直接由政府从纳税人的工资中扣缴,而大多数劳动者已经养成了计算“税后”工资收入的习惯。多年来,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变得累进度越来越小,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毫不夸张地说富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税收漏洞。工会和民间组织并没有为劳方和穷人争取漏税的机会,而是力图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堵住富人的税收漏洞。

(3)我记得在1967年某天的早晨看过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全是有关福利斗争、教师罢工、政府向企业发放的新补贴、税收冲突等的报道。这是我第一次明白阶级斗争的矛头已经(部分)转向了国家及其财政预算²——这是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运动具有重要蕴涵的现象。

(4)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见证年代久远的《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改刊为《社会主义革命》[现已改名为《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³,而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创刊号(1970年)上发表了首次尝试从理

论上论述国家财政预算问题的文章。政治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不久前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且邀请我去位于(西德)施塔恩贝格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智库工作4个月。我在尤尔根·哈贝马斯智库发现了一种令人愉悦、积极向上的批判氛围。哈贝马斯正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矛盾问题(或者操纵问题),而奥菲则在致力于政治合法化问题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我本人的国家财政矛盾(或者危机)具有补充作用,因此,对于我们以及更加一般的社会理论来说,这可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

(5)我在《社会主义革命》上发表文章(1970年)到去施塔恩贝格做学术访问(1973年)期间,我利用在夏威夷度假的时间完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主要论点的构思,或者说已经想清楚我要在书中阐述的主要论点。这个论点就是“国家扩张是因为它要发展”。我突然来了灵感,一下子恍然大悟,我要从不断扩增的预算和国家(请看下文)的角度对国家预算(和国家职能)的扩张进行理论阐述。

不管怎样,大约从1980年以来,世界上两个紧密相关的历史性现象明确要求修正我的预算理论。在一个以美国为最大霸权的国际体系下,资本全球化(至少)恢复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而新自由主义学说和实践因美国(更一般地说北方)领先于南方而重新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此外,在事后看来,我们能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资本全球化的政治形态,而资本全球化则曾经(现在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互为背景和内容。全球化的发展(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在宽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聚积了更多的全球资本。因此,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联系。随着全球资本寻求更多的全球投资机会、更大的市场和更容易剥削的劳动力,政府和国际机构越来越强制地在南方并且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在北方推行新自由主义。以上种种发展结束了某些人所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运动、英国的工党执政、美国的新政以及南方的民族主义发展)。

暂且先把以上这些话题搁在一边,今天,我仍然要为“国家扩张是因为它

要发展”的财政危机论(但不是本书全部具体的分析内容)辩护,并且还要强调一点:出于谨慎的考虑,笔者要加一条“本书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及国家和国家预算进行的研究”的免责声明。然而,读者可能在其他国家同一时期以及当今全球化时代发现很多“财政危机型”现象。

财政危机会造成很多后果。我遇到过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国家工作人员、工会会员和其他人,他们都在思考 20 世纪 70 年代初哀悼鲁迪·多茨克(Rudi Deutsche)这种政治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一般问题。这种思考的基本状况是新左派止步不前,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现代国家性质和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预算意义这些问题上死抱“陈腐的准则和过时的口号”不放。这方面的不足或者缺失给了我启示,在一位德国政治学家的帮助下创办了《资本主义国家》(*Kapitalistate*)这本刊物。这本主要发表所谓“国家理论”研究成果的刊物维持了 8 年。我在美国组织了一个由克拉伦斯·洛(Clarence Lo)、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玛格丽特·菲伊(Margaret Fay)、大卫·戈尔德(David Gold)和另外 6 名比较年轻的左翼学者(后来都在——运动、决策和行动主义研究等方面——学术界出了名)参加的编委会。《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表很多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和著述,但肯定是一本有影响的刊物。原因就在于激进分子圈子、工会和其他团体内部对国家能被寄予怎样的希望(是胡萝卜还是大棒)、为了捍卫已经受到损害的利益应该在国家内部如何开展反对国家的斗争以及(除了许多其他疑问和问题外)国家预算和行政管理如何且为何通常会影晌本国宏观经济这些问题的认识混乱不堪。当时也有其他有关国家财政的研究成果发表,其中有些还采用了财政危机论及其相关方法,另一些发展了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新式的辩论接连不断,很多有关国家预算和计划的历史研究相继问世,还有学者开展了关于国家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终形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国家学说和研究学术产业。此后,不断有人创办主要关注国家和相关问题的中左翼刊物,一些从未发表过这方面文章的杂志也开始转载《资本主义国家》刊发的文章。到了 80 年代中期,在我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职位 6 年以后,“国家理论”(一般而言)和国家

财政(具体来说)已经成为——尤其是政治社会学和在“左翼韦伯学派”的学者中间——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很多左翼学术刊物、左翼大众杂志和一些主流刊物纷纷刊登有关符号政治、“无成本主张”和国家政策以及国家与人力、自然、社会资本理论发展成果和很多其他问题的文章。

直到那时,我始终致力于关于美国并且由此引申到西方劳动阶级发展、美国国民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阶级构成变化、葛兰西(Gramsci)式意识形态和美国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⁴在我重新达到我认为充分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论述的劳动和社会运动问题的水平时,我对“国家理论”产生了厌倦,但有两项工作明显例外:一是写本书第七章“积累危机”(Accumulation Crisis);二是写一篇名为“生产条件与条件生产”(The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nditions)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运用“国家学说”解释了环境和社会冲突与国家在这些冲突中的作用或者“职能”之间的关系。⁵

至于我本人的政治主张,我成了一种通过“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斗争来推进国家官僚政治(行政管理)民主化的新的或准列宁主义策略的辩护者。我曾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这是一种激进的取胜策略,但能克服卢梭(Rousseau)式国家学说阐述和标准无政府主义国家观(两者都摒弃了一种非常民主化的国家管理方式)的弱点,而且与国家官僚政治(与民选机构或者代议机构形成鲜明对照)以彻底政治变革为关键手段的新“激进民主”运动——社会机构充分民主化的要求——非常契合。有些学者同仁创造了一些新的术语,如“人民官僚政治”。他们创造这个新词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和更快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韦伯所定义的那种科层制或者官僚政治(一种完全的列行公事形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宽泛地定义更加强调个人主动性、信息和决策权水平分享以及国家多孔结构的行政管理(或者官僚政治)的做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是说得通的。

当今美国几乎每场围绕生产条件展开的斗争,至少隐含地具有它的政治目的——国家决策民主化,但斗争的参与者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来举一个局部例子,在圣塔克鲁兹(Santa Cruz),虽然无家可归的活动分

子和妇女反家庭虐待及暴力运动为了争取改变警察机关内部工作分工和奖励制度以及警察工作的确定方式,都已经渗透到市政府和警察局内部针对市政府和警察局的斗争中,但这两个团体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具有相同的政治目的(但都明白自己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动用了政治手段而展开斗争)。在国家 and 全球层面,目前为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最近)世界贸易组织民主化(或取缔这些组织)而进行的斗争都显示了今天“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性。笔者有关这个主题的著述“自然因素”(Natural Causes)和“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分别发表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在 1988 年帮助创办的刊物上。

* * * * *

今天《国家的财政危机》的读者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许就是:国家的财政危机是由什么引发的?它会消失吗?至少会从美国消失吗?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正在把平衡预算作为其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计划(SAPs)的组成部分强加给南方国家吗?“新民主党人”[如克林顿(Clinton)]和“第三道路辩护者”[布莱尔(Blair)]正在采纳一种以类似于《国家的财政危机》中定义的方式把(譬如说)教育和卫生支出作为社会或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供给侧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是也摒弃了“国家支出不能发挥任何生产性作用;为了降低利率并释放货币以增加私人投资,为了刺激私人积累资本的动机,国家就应该大幅削减税收”(从而摒弃或者限制凯恩斯主义“国家支出为支撑总需求所必需”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国家应该削减课征于劳动人民的税收”)的观点吗?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眼下确实出现了盈余,部分联邦债务也已经偿还,大多数州政府也正在出现财政预算盈余或者正在推行平衡预算。但是,这些盈余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支出——主要是社会资本支出——在(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在零增长趋势线上下浮动以后)90 年代增长了 4 倍。受过教育的(间接生产性)劳动力、港口与机场和高速公路运能、生物工程农作物和有机种植业方面的农业研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社会投资供给促成了 90 年代的经济繁荣(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的角度看,无论如何更像是一次“适度扩张”,而不是“经济繁荣”)。

事实仍然是:《国家的财政危机》没能预期到苏联解体以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崛起以及美国政治霸权地位的重新恢复。这些革命(或者反革命)性变化对于美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美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又反过来对美国的国家财政和预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笔者完全清楚20世纪50和60年代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⁶但还是没能把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成果融入《国家的财政危机》(请看下文)。

《国家的财政危机》没能预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财政预算出现盈余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背景,而是笔者写这本书采用的方法——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解释国家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方法来展现我本人的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采用以下两种预算观点中的一种:首先是采用一种规范观——对照新古典福利经济学⁷(顺便说一下,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全球论据以发展的脆弱基础之一)——来说明怎样的财政支出和税收结构才算经济上有效、社会上公平;其次是采用实用观说明宏观经济稳定问题。⁸

在20世纪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国家财政预算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被视为一个政府可用来调节总需求以避免或者控制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外生变量来处理(一种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而在美国出现的观点)。笔者当时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各种不同的支出项目起初如何和为何被列入预算以及这些项目为何代价不同。换句话说,笔者摒弃了“事实上用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可取的国家政策来解释主要预算项目及其在时间上的变化”这种规范观(愿望观)。

无论纯粹的宏观经济学式的论证在特定情况下有多么高的效度,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都不值得关注。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论证方法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依我之见,在阶级社会不可或缺)。因此,“财政危机”论基本上并不是一种宏观经济学论证方法,而是一种依赖以下两方面观察的理论:首先是政治经济学观察,其次是政治社会学观察。

首先,鉴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性质,国家必须修建(比方说)更多或者更好的高速公路,作为公路运输和上下班交通的实物投

人。道路(以及空港、海港等)扩建或者现代化的失败会推高出行(或者货运)成本,因此会增加工资成本(或者交通成本)。这种论证或者推理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性”和市场的作用。这种预算支出被笔者称为“社会资本支出”,因为它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阻止劳动生产率下降)。作为社会资本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本是另一个例子:与价值创造和实现相关的人的心智能力扩展也会以不同的方式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率。结果就是:允许劳动力多接受几年教育的国家通常经济效率和工资水平都比较高。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收入平均要比只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高出整整1倍。

物质和人力社会资本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都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投入侧的因素。这方面论证的第二部分属于产出侧。社会资本是私人生产的一种投入品,并且可大致测量私人资本能够免费占用多少社会资源,或者说私人资本以最低的费用需要多少社会总产品中的社会资本。私人生产不但反过来能够产出可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且还会产生不可转嫁的社会成本,更一般地说,会产生令人讨厌的社会后果。这些社会成本和后果是一种粗略测量私人资本在毫不赔偿受害方或者受害各方(有时包括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能够导致多大危害的尺度。最广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成本合在一起就能衡量私人资本对政治系统产生的影响力。例如,有大量的社会成本没有得到补偿,这表明工会、消费者群体和社区组织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力有多么小。

“外部化”成本或者危害名目繁多:环境和生态破坏、城市污染和拥堵、高租金、不安全或不卫生的饮水和食品、泥土流失、地下水枯竭、森林覆盖面积缩小、劳动者健康状况和社区卫生状况不良、失业和贫困以及更重要层面上的社会秩序混乱和政治合法性丧失。为了减轻或者补偿这些经济外部性而配置的国家预算资金可以成为“胡萝卜”,也可能成为“大棒”(比方说,安排更多的福利支出或者增加警力、多修监狱,把更多的预算资金用于发展有机农业或者用于镇压反对农业产业化的社会运动,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戒毒或者反毒)。笔者把花在这些“胡萝卜”和“大棒”式用途上的国家预算资金称为“社会费用”。

总而言之,国家的社会资本支出有利于私人资本的增加或者积累。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导致很多种类的“负外部性”或者对劳动者、社区和环境造成危害。从历史上看,这些负外部性(先是在西方,目前是在全球任何地方)引发了

要求私人资本停止或者减轻对不同方面危害的劳工和其他社会运动。或者,更经常的是,社会运动要求国家赔偿在经济增长博弈中受到私人资本危害的“输家”。这些“输家”包括生计受到大企业威胁的小企业和小农场主、失业者和有工作的穷人。在不能确定任何特定“有罪”资本的情况下,国家还要安排环保经费来清洁有毒垃圾堆场(如根据“超级基金法案”建造的污染物堆场)。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把满足这些要求的希望寄托在过错方(或过错各方)或国家预算身上,或者同时寄托于过错方和国家预算。社会运动在政治取向上可能偏左也可能偏右,而它们提出的要求有可能导致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并安排更多的福利支出,或者增加警力和判处更严厉的徒刑。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国家往往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费用来减轻资本主义私人积累造成的不良影响。

根据财政危机论,国家通过社会资本支出来履行其“资本积累功能”,而通过社会费用支出来履行其“合法化功能”(这个功能也许只有执政的政府、某个政党或者某种政治制度本身才有)。资本积累功能和合法化功能这两个术语或许用得不够恰当,因为《国家的财政危机》的某些评论者断定我这本书有“功能主义”之嫌。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催生某些需要,也会催生满足需要的政治、行政和财政手段。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而是相信资本主义是一种高度矛盾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运动、国家内部的公司权力以及国家政策通常会产生很多非计划或者非预期的后果。我仅以一个矛盾为例,即资本作为整体(可被定义为执政党)的功能需要与个体资本(或者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说明。这个矛盾会不断推高政府的支出。2000年5月,美国政府计划削减1%~2%的老年人医疗保险居家护理支出,但实际减少了10%~20%。残疾人和老年人没能获得医疗保险居家护理的准许,因而不得不在费用更加昂贵的私人疗养院和医院逗留比在获得居家护理准许的情况下更长的时间。很多住不起私人疗养院的老年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可是一种终极“外部性”)。政治上组织精良的制药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阻扰旨在寻求一种解决医疗卫生费用不断增加这个问题的成本较低的一般方法(一种普遍需要)的努力。因此,医疗保险账单只增不减,而且等到居家护理基金重建以后有望进一步增加。

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笔者显然是要根据经济学理论，运用国家财政预算来解释经济中发生的宏观经济变化（社会资本支出立刻就能为经济增加产能和需求），而不是相反；这在当时是一种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标准方法。当时且就在当时，笔者已经设法用（最初由社会资本支出诱发的）宏观经济变化的负面效应——社会费用——来解释预算总量增长和构成变化。

那时，笔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财政危机理论中的“缺少环节”，即社会费用增加的经济宏观表现效应。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社会费用并不是资本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基本上就是剩余价值的流失，因而也是资本积累的流失。这种理论由保罗·马迪克（Paul Mattick）提出，但涉及国家总体支出，而不是只涉及社会费用。其他学者也曾试图研究福利和政策功能增大的劳动纪律或士气效应以及贫民窟增加和投资减少的影响效应。笔者也许应该在自己所说的“美国福利/战争国家”的战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有趣的是，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布里斯托·哈丁（Bristow Hardin）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从教育补贴、住房补贴、医疗卫生和儿童看护、保险金和养老金的角度看，美国军事部门就是美国的福利国家，或者说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⁹这是笔者很多以批判方式发展国家财政危机论的研究之一。或许，如果笔者能完全遵循“国家财政危机”累积模型固有的推导思路，那么就能更好地预见到某些新自由主义改良——如取消福利。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应该做的是找到国家预算的未来而不是宏观经济发展逻辑。我注意到了国家支出与国家收入（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我把它称为“财政危机”，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我在这方面已经说到了点子上：我提出的“社会—工业综合体”¹⁰概念——既能降低社会资本成本（如大众汽车交通、卫生领域的健康维护组织）又能降低社会费用成本（如监狱看守、福利“改革”）——准确地预测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势的实际变化。然而，如果我能进行包括社会费用增长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内的完整推导，那么，我的“预测”依据将更加可靠；如果我能预期到南方正在发生的大量变化，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计划到90年代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俄罗斯发生的债务和外汇危机，那么，我的“预测”依据就会更加可靠。

但不管怎样,我应该补充一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关于巴西和墨西哥以及另外一些南方国家的研究——其中的有些研究受到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的启发,根据当时的主要现象,即80年代的南方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发展——对财政经济学和财政政治学进行了理论阐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几大支柱——私有化、外汇市场和投资自由化、放松管制和协调发展——都能与《国家的财政危机》中的分析内容相容,但如上所述,对新自由主义的适当解释需要一种比我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构建的理论更加全面的理论。

如果笔者能把当今全球化的作用考虑进去,那么就必须修改本人为了研究美国资本主义财政危机而开发的美国资本主义基本模型。简单地说,原始模型中有垄断、竞争和国家三个经济部门。笔者证明了垄断部门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典型的劳动节约型,且常常是劳动摒弃型,因而趋向于增加对劳动密集型竞争部门和国家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自然能够发现远多于这种简单关系的内容。但不管怎样,劳动力从垄断部门向竞争部门转移的观点足以说明今天的全球化是如何要求我们为了保证原始模型的效度而对它进行更加切合实际的修改。当然,是垄断部门正在(以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外包、缩小规模或裁员、创建竞争力更强的跨国合资企业、跨国并购、为很多商品建立世界统一市场价格等的形式)推进全球化。虽然大型制造业(垄断部门的核心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过去20多年里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对产出的比率确实是一落千丈。鉴于新自由主义减缓了政府部门就业人数的扩张,结果就是“廉价”劳动力充斥竞争部门,从而激活了各类至此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企业或者促使大资本扩张创建了各种小企业,进而重新导致美国非洲裔美国和其他受压迫少数民族陷入糟糕的生存状态。

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亚洲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合法和无身份外籍工人的增加(进一步导致货币工资下降)促进了低工资竞争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笔者认为,这是在没有刺激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导致美国20世纪90年代就业人数增加的单个最重要因素),同时又削弱了垄断部门工会的作用(因而导致垄断部门货币工资增长速度放慢,并且还降低了该部门劳动力的平均成本)。

同样,竞争部门货币收入的减少迫使该部门劳动者的家庭为了维系既有的家庭收入水平而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从而导致小企业进一步降低货币工资。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这种状况已经形成了一种一般家庭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进一步减少、房租上涨的恶性循环,最后新生的“有工作的穷人”阶级被迫迁徙到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的城市和地区。

因此,2000 年新的低通胀、“充分就业”、低工资美国经济在美国主导高度竞争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出现受到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计划的抑制。美国的这种新经济与资本集中(即通过收购而不是新建方式实施的资本扩张)相结合,就成了“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的增长方式,而且还导致大多数人在 1996 年之前没有加过工资。垄断部门本身也受到了外国大资本的冲击。因此,这个部门的货币工资增加没能跟上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但这种状况部分被外国公司来美国投资所抵消,因为工会很难甚至不可能渗透到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经过新自由化的联邦国家部门没能吸纳它自己“正常”或者惯常份额的失业者,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竞争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使我们的原始模型复杂化,但其实质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不再经常表现在国家和国家财政方面,而是表现在小资本或竞争资本部门。结果就是占美国劳动阶级 $1/3$ 或者 $1/2$ 的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实际收入受到了影响。换句话说,国家的“合法化功能”不再需要经济输家(即小企业或其员工)“买单”,就像“冷战”时期那样,不同政党和政府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冷战”这个政治共识。合法化问题已经转变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问题。提高本国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家的第一要务——对于国民经济在过去已经很好地实现一体化的美国来说是要务之一。在 21 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社会保险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差不多完整地存续了下来,但是,养老和医疗保险(以及有可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新规则实行私有化的供水、供电、教育和其他设施)的私有化也有可能摧毁那些传统自由民主的堡垒。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财政制度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作用已经表现在以下